

## 南次郎与熙洽密谋建立伪满政权的经过

王德五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但在国际间引起了极坏的反响，就是在它国内，也有人抱着不同的意见，因而陆相南次郎不得不引咎辞职，转为军事参议官。不久（日期不详，可能是1931年底，或1932年年初）他就单身一人密来东北，在沈阳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及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等共同研究如何有利于事变的进展。南次郎根据他们拟定的方案，在沈阳先同臧式毅会谈，据说当时臧式毅不肯明白表示自己的意见，只说他本人决心和熙洽合作，一切以吉林的主张为主张；对于日军拟定的方案，一任熙洽来决择，他和吉林当局采取一致的行动。这样一来，主要的关键就落在吉林熙洽一人的身上。于是南次郎电令吉林长官公署顾问大迫中佐向熙洽致意说他来访。

某日（日期忘记）夜里，我（当时我是吉林全省警务处秘书兼财政厅秘书）接到财政厅长孙其昌电话，要我在次日清晨和他同车到吉林车站去迎接日本贵宾。我心中纳闷：日本贵宾是何许人？第二天早晨，当我和孙其昌同车去车站的途中，才知道是熙洽派孙其昌为代表迎接南次郎，要我作翻译，而南次郎远道来会熙洽为的是什么，不但孙事前不知，就是熙洽本人也捉摸不透。当时车站内外戒备森严，日本宪兵全副武装，数

步一岗；月台上除有少数的铁路值班人员外，日方迎接的有石射猪太郎领事、大迫中佐和值日日本宪兵队长几个人。南次郎下车后，孙其昌迎上前去，表达他代表熙洽来迎接之意。南次郎由他自己带来的中岛翻译对孙其昌说：“请转告熙洽君，我先到领事馆用过早饭之后，在10点钟左右去探访他，我希望能同他单独会谈，不必有外人，翻译由我来准备。”说罢登车而去。

10点钟左右，南次郎带着中岛翻译到吉林长官公署，熙洽从大门外把他迎接到客厅。于是他二人在极秘密之中开始会谈，当场仅有中岛一人作他二人的翻译。尽管会谈是很秘密，其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在南次郎去后，熙洽立即把他们这次密谈的真相，全部告诉了孙其昌。事后据孙透露，南次郎熙洽密谈内容（自然都是熙洽告诉孙其昌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南次郎说：他这次来东北，是专门为同东北当局商讨如何来结束目前东北的混乱局面，希望东北当局能够明确表示态度和意见。

（二）南次郎说：对这方面，日本政府拟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赶走张学良改用张作相，在东北建立特殊行政权，统一新局面；另一个是脱离国民党的南京政府，迎接溥仪来东北建立满蒙独立国。

（三）南次郎表示：日本政府没有成见，对这方案任凭东北当局自由选择，但是两者之中必行其一。

（四）南次郎说：在沈阳也曾和臧式毅会谈，而臧不肯表明意见，只是说愿意以吉林的主张为主张，两个方案听从吉林选择，他坚决同吉林合作，采取一致行动。

（五）南次郎说：臧式毅既然是对你们吉林是这样信任，那你们吉林就必须明白表示出自己真正的主张，不使臧氏失望。

（六）熙洽说：东北目前的混乱局面，必须及早设法结束，

不应再事拖延，在这一点上他和日本政府抱有同样意见。

(七) 熙洽说：在办法上，他不很同意日本政府所拟定的第一个方案，因为他深知张作相昏庸无能，难负众望，对统辖东北整个的局势，难以胜任。

(八) 熙洽表示：对于日本政府拟定的第二个方案极感兴趣；因为溥仪是满清逊帝，东北本是满清发源地，东北人民对逊帝溥仪有一定的感情，所以他同意迎接溥仪来东北。

(九) 熙洽表示：他同意脱离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建立满蒙独立国，但是顾虑国际上是否加以干涉；他也赞成迎接溥仪来东北，可是怀疑溥仪是否肯来。

(十) 南次郎说：任何国际间的干涉，都有日本政府来负责，迎接溥仪前来的一切筹划工作，他们也要安排妥当，这两点都不必有任何顾虑。

在这次密谈中，熙洽明确表示他同意迎接溥仪来东北、建立满蒙独立国的态度，很为南次郎所佩服。孙其昌听到熙洽告诉他以上这些密谈情况之后，立即对熙洽表示，他同意熙洽的意见，拥护熙洽的主张，这就给熙洽直接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孙其昌曾这样说过：“熙洽对张作相的评价是正确的，张作相根本不可能统管东北的军政大权。至于熙洽为什么要赞成溥仪，这更是不难理解的。溥仪、熙洽都是满清爱新觉罗的后裔，宗族的观念可能导致其复辟的思想。日本人的主张既得到熙洽的同意，则沈阳的臧式毅自然不会反对。看来这是大局已定，大势所趋，还有谁不高举双手表示拥护的呢。”至于熙洽为什么要把这次密谈的情况立即告诉孙其昌呢？原来是这样：在“九·一八”事变前，熙洽是吉林省军参谋长，孙其昌是吉林省署建设厅长，那时期他二人的感情并不十分融洽。但在这次事变之后，吉林省军政双方抗日派都不满意熙洽投靠日寇的行动而纷纷出

走，留下来的孙其昌等亲日派，无形中就形成了志同道合的密友。这些人都是极力拥护熙洽亲日主张的，所以熙洽对这些人自然是封官许愿极尽拉拢，而在这些人当中，要算孙其昌的资格比较老些；并且当时吉林省内各县的县长、税捐局长中，同孙其昌有关系的人很多，熙洽为巩固自己的势力，就不能不借重于孙其昌，因而事无大小都要同他商量，所以尽管这次南次郎、熙洽会谈如何秘密，而在事后熙洽还是要立即告诉他，其原因就在于此。

南次郎这次来东北，总算不虚此行顺利地完成了它预期的目的；熙洽的明确表示，也可以看作是臧式毅所不能反对的，使他收到“一石双鸟”的功效。自然他是极满意的，可是中国东北3 000万人民的悲惨命运就由这次密谈所注定；14年的沦陷期间，出现了无数的大小汉奸，人民作了亡国奴了！

## 二

南次郎在吉林得到了熙洽的明确答复以后，心满意足地回到沈阳，自然要一方面把熙洽的主张通知臧式毅要他通力合作，一方面命令关东军要加紧进行筹划，早日建立伪国家。这种情形当然不在话下。吉林方面，熙洽在南次郎走后，立即把密谈的内容告诉了孙其昌、李铭书、荣孟枚、郭恩霖、谢介石、张燕卿、修长余等，随即进行了一系列的叛国活动。

1932年2月14日夜里10时左右，我接到警务处长修长余从长官公署打来电话，说是有一份文件送来，要我连夜翻译出来。我接到手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誊写油印的日本文的满蒙地方自治章程草案，其宗旨大意是：东北人民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腐败，为了反抗张学良等军阀的统治压迫，各市、县的机关法团人民团体，自动地组织起来，成立代表民意的各级

政府，脱离国民党，驱逐张学良，实现满蒙地方自治。其章程内容，有自治会的成立，代表的选举和代表的职责权限等多少章多少款（已记不清）。我看过之后，心想日本人伪造民意，看来满蒙的独立，是势在必行。当时我找来录事一人帮忙，我一面逐条翻译，录事一面缮清，整整忙了一夜，到天亮总算把这份任务完成了。

就在15日这天早晨，修长余从长官公署回来，把这份“满蒙地方自治章程草案”的翻译本拿到手还没细看，就对我说：“你赶紧换衣服，咱们一同到车站，熙长官要你同他们一起到沈阳去。”当时我来不及细问究竟，急忙换好衣服就和修长余同车赶到车站。车开之后，我才知道随同去的有财政厅长孙其昌、秘书长荣孟枚，以及副官、会计、庶务等十几名。熙洽、孙其昌等因整夜未眠，在专车上合衣而睡。我也是长不起精神，慢慢地进入睡乡。一觉醒来，车到长春，下车到大和旅馆稍事休息，下午专车接上满铁线，一路南下。这时候在车上我同孙其昌在闲谈中，才知道熙洽是应张景惠之邀（自然是关东军的授意）到沈阳参加“东北政务会议”，讨论进行筹备建立满蒙独立国事宜。晚8时半，车进沈阳南满站，我紧跟在熙洽身后一同下车。当时到车站迎接的人很多，臧式毅首先上前同熙洽握手，互道“一言难尽！”这时我猜不透他们是一种什么心情。随后有关东军参谋长三宅，代表本庄繁向熙洽致欢迎之意，然后土肥原、赵欣伯等多人上前致意。继由臧式毅陪同先到大和旅馆，宾主们在大客厅里畅谈（在这里我第一次见着曾在江桥抗战的马占山）。后来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提议说，本庄司令官约请各位明天会面，现已夜深，希大家早些休息。于是主人们相继散去。熙洽一行十几名的住所，关东军原来预备在这个大和旅馆，熙洽认为不太方便，臧式毅另给介绍到城内利达公司（奉天省官营

收购特产的公司)，到那一看，熙洽又嫌其狭小，最后搬到三经路德国人经营的凌格饭店。

张景惠（原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驻哈尔滨）秉承关东军的指示：以东北政务会议的名义邀请奉、吉、黑三省首脑在沈阳集会。由于吉林省的熙洽、黑龙江的马占山已按期到来，乃于2月16日<sup>①</sup>在沈阳大和旅馆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亲自主持，举行了出卖东北、建立伪国的筹备会议。会议接连举行了四五次，大部分是利用夜间在日本妓馆（八千代翠庄）进行的。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事前由关东军所指定，其中有奉天省的臧式毅、吉林省熙洽、黑龙江马占山、东省特别区张景惠、奉天市长赵欣伯、奉天维持会袁金铠、奉天自治指导部于冲汉。关东军出席的有参谋长三宅、高级参谋板垣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等。根据关东军制定的建立“满洲独立国方案”，进行互相交换意见。由于关东军方面事先已经分别同上述这群汉奸们有所接触，所以这个方案就很顺利地得到全体同意一致通过。因为关东军仅仅决定了溥仪为满洲国执政，袁金铠为参议，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于冲汉、赵欣伯分别为监察、立法两院的院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等人选，而对国务院下设各部总长的席位一任汉奸们自己去商量分配，所以大家在这个方面比较表示很大关心。熙洽、臧式毅有着一个共同的愿望，他们既舍不得现有省长的地位，而又都想着弄个部的总长当当。同时他们的部下又都分别包围着他们，希望把总长的席位多得几个。经过各方面一再磋商，最后决定臧式毅任民政部总长仍兼奉天省省长，熙洽任财政部总长仍兼任吉林省省长。各该总长由于不能经常到部，设次长一员代理部务。其余尚有五部，外交、实业两部总

<sup>①</sup> 关于这次所谓“四巨头会议”的召开时间，不同史料记载或回忆有所差异，参阅本书《伪满国出笼经过》一文。

长由吉林省选出；交通、司法两部总长，由奉天省选出；剩下一个文教部，留给国务总理适当安插。这样大家都心满意足，会议乃宣告结束。

随熙洽这次前来沈阳的孙其昌、荣孟枚两员大将，在熙洽心目中，认为孙其昌经得多、见得广，有办法、有主张，遇事同他商量，可称为一个好参谋长；所以每次会议归来，总爱向孙其昌叙说情况。同时孙其昌在这里又一天一趟去拜访老前辈袁金铠、于冲汉两位辽阳同乡，直接间接地得到很多消息。起初孙其昌认为，这次的国务总理一席，可能是熙洽，因为熙是头一个赞成日本人在东北搞独立运动的，而且又是溥仪的宗族，那么他自己可以弄个财政总长当当；但是后来的情况不是这样，感到非常泄气。当熙洽从会场带回来吉林省分得外交、实业两部总长和财部次长席位时，在孙其昌脑海里起着很大的斗争；为名自然是总长的地位高；为利也得说财部次长的油水好，一时之间取舍无定。正好在这时期，张燕卿（吉林省实业厅长）和谢介石（吉林交涉署长）从吉林赶来，熙洽把孙其昌、荣孟枚、张燕卿、谢介石等人都召到屋里，共同商量如何来安排总长人位的问题。熙洽表示要让谢介石担当外交部总长，让孙其昌担当实业部总长，张燕卿担当财部次长，问大家的意见怎样。大家认为谢介石、孙其昌分掌外交、实业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张燕卿一再表示，说财部的事务比任何部都复杂，总长既然不能够经常到部，就势必有一位熟悉财政情况的人来代理部务，才能不负总长的托付，自己对财务行政一窍不通，怎么能胜任呢？大家虽然认为张燕卿说的有道理，但是一时谁也说不出好的办法来。沉默了一会，孙其昌说：“这样吧，我和张燕卿调换一下，让他到实业部我到财部，替熙二爷掌这个摊子，部长也罢，次长也罢，我不考虑这些，我总认为吉林的事情就应当我们自己

来解决。”大家都说这样也好。就这样，吉林省分得的总长席位人选确定了。张燕卿很幸运地得到一个伪实业部总长。从这天起他和谢介石，心情焕发，一道地在沈阳向各方面大事活动。

以后溥仪在日本人的欺骗利诱下，欣然应诺来东北主持大计，由关东军派员把他先从天津带到旅顺，然后又转到汤岗温泉，最后于3月初送到长春。3月8日，溥仪在伪新京（长春）正式宣布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同时任命了伪满洲国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并举行了特任式，于是伪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

3月9日以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为首，举行第一次阁议（各部总长内阁会议），出席的有：民政部总长臧式毅、财政部总长熙洽、军政部总长马占山、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司法部总长冯涵清、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文教部总长郑孝胥（兼）、国务院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原关东军政治部长）。会议讨论各部的组织机构和司长级以上的人事安排事宜。本来各部总长对部内的人事安排，早在心目中都有了初步计划（有的正在封官许愿），但是谁也没有马上提出来。这时候驹井德三以总务长官掌管人事的身分，拿出一份各部日本人主要官员的名单向大家宣布。按照这份名单，则各部的总务司长和其他主要司长都要日本人来担当，这的确是使大家感到愕然，都在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沉默片刻，熙洽说：“这怎么能成呢？满洲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聘请几名日本人作顾问则可以，安置这些日本人作官，成何体统？”驹井一听勃然大怒，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说：“满洲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它包含着满、汉、蒙、日、鲜五个民族的国家。它有五种民族的老百姓，就要有五种民族的好官吏，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况且满洲国是怎样成立的？难道说不是日本人用生命换来的吗？日本人是诚心诚意地希望着满洲国将来是能够富强康乐的，但是这种富强康



乐，必须有日本人的全力指导才能获得。所以说日本政府派遣它的优秀官吏到满洲国来，这完全是一份好意。你们就应该表示欢迎，而不应该稍有敌视和怀疑。”这一番话说得大家都不敢正视他，一个个默不作声，会议也就不欢而散。据孙其昌说熙洽懊丧而归，大有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之慨，但是人们有谁能肯相信熙洽受到这次打击之后，能够真心悔悟呢？

（政协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

## 黑龙江省的所谓“东省特别区自治”

板垣征四郎诱降张景惠

松本益雄\*

昭和6年（1931年）5月，我被调哈尔滨任总领事馆对华关系的负责人，在大桥忠一总领事的领导下工作。

哈尔滨是当时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事参议院议长张景惠的根据地。张身为东北三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在北满握有实权。因身兼南京的军事参议院议长之职，因此，常常往来于奉天和哈

\* 曾任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秘书官，1986年6月曾来长春访问，他表示愿以有限余年，为中日友好事业做贡献。